



全球化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新思维

金 砢

【核心看点】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由于经济复苏缓慢,各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严峻,有些国家甚至陷入困境,加之全球治理和安全形势面临极大挑战,所以各国都在寻求应对之策,包括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整。这直接涉及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政策抉择,是继续促进全球化还是转向逆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世界舆论焦点。当前,人类发展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时期,而工业化必然要求经济全球化,实行自由贸易规则;但是,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同,而且,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又各具特点,因此如何变革制度、调整政策以应对挑战,也会有不同的观念、思维和立场。在这样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也需要有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



产业转型升级的全球化背景是什么

人类发展漫长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将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卷入其洪流之中,从供给推动与需求拉动两方面发力,实现人类历史千万年未曾有过的现象: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彻底改变了人类发展轨迹——市场经济兴盛、工业化不断扩张、全球化不可阻挡。

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开始发生了极大变化。特别是世界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完全是“旧貌换新颜”。中国产业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展,经济体量大幅增大,建设能力大为增强,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大国作用。同时,世界经济也面临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平庸”态势,一方面,发达国家作为产业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作用减弱,特别是实体经济创新

不足,甚至发生产业“空心化”现象;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扩张,实行平推式工业化战略,以低成本替代方式大规模获得“低垂果实”,占据产业“开阔地”,导致相当一部分产品的市场饱和,以至于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都面临着迫切的产业转型升级课题。发达国家希望重振制造业,实行再工业化;中国也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振兴实体

经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更广泛深入地加入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强盛。可以说,在全球化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课题。

当然,虽然同为产业转型升级,但各国所处的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各有差异。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后发经济体,大国、小国,沿海国家、大陆腹地国家,情况千差万别。而且,各国经济开放的现状也很不相同,有的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已经相当高,有的国家尚处于正在迈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对于全球化的态度甚至立场和应对策略也必然会有各自不同的选择。

从理论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但工业化与全球化也并非完美无缺,在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总是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人类为此也难免付出各种代价,有些代价还可能相当沉重。因此,“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从来就是全球化的伴生现象。

中国工业化走的是一条具有特色的道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结果是因此而深受全球化之益,经济高速增长,生产能力大幅扩张,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比肩之势。

此时,一些曾经的自由贸易主张国和全球化规则主导国反而开始犹豫了,感觉自己是否走得有些“过头”了。于是全球化新时代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些



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演变

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主张,甚至在一些领域实行反全球化政策。当然,这里所说的“一些发达国家”,准确地说是在发达国家中的一些人,这些人的主张开始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产业竞争和国际贸易的局部领域,而是发展到公开扯起反全球化的旗帜,并且还能得到国内许多民众的支持,甚至成为实际政策。

我们仅仅将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视为民粹主义抬头,是不够的。其实,这一现象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即

当代世界产业结构及国际竞争力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尽管在总体上还处于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的状况,但是综合竞争力已经有了极大提升。特别是,由于国际产业转移所导致的发达国家产业生态的高端专业化,反而削弱了其产业丰厚度,即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配套性减弱;而中国尽管在产业的高端技术上还不是太强,但产业的丰厚度大大增强,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配套性非常强大,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很大优势。

另一种情况是,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所导致的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例如移民以及同其有关联的国际恐怖主义蔓延等,也使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产生难以承受其社会压力的困惑,因而倾向于“逆全球化”之策,来应对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当然,之所以出此招,也有其为难之处,即如何在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演变的新态势下使本国产业仍能占据有利位置,以及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进行有效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治理,以至全球治理。这些问题都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要有哪些新思维

在全球化新时代的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新常态下,中国也面临着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两大课题: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和进行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治理,以引导经济发展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走向合意的方向。

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各种要素的可迁移性大大提高,任何企业、地区和国家,都要采取有效方式,来应对要素的高迁移性,尤其是人力资源的高迁移性。当然,要素的高迁移性也会进一步提高企业在国家和地区间的迁移性。通俗地说就是:一国及各地区如何确定自己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哪些产业或产业环节可以配置于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哪些产业或产业环节应该扎根于本国或本地区?所以,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实现产业根植:即如何发展具有本国根基或地区根基的产业?应对这一问题,需要有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全球化新思维。这一问题在中国当前的产业转

型升级中,正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第一,技术创新可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工业化空间。那么,技术创新的方向是什么?不仅仅是用新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而且,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是,实现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用高技术支撑和改进传统产业。欧洲在规划其制造业发展方向时,所提出的第一个“超越目前在资源效率和再工业化方面的现有边界的方式”就是“重视所谓的低技术制造业”,而且要让制造业重新回归城市环境,用高技术把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为情感工厂。

第二,产业升级不仅是技术升级,更重要的是劳动适应,更有效地实现就业结构变革与人力资源国际配置。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劳动力资源的变迁性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特别是高素质劳动者遵循“良禽择木而栖”的就业方式,企业必须学会雇用和管理具有较强变迁性的人力资源;同时,劳动者的技能转换同产业技术的变化并

非相同周期,在工业技术变革较快的时期,产业技术升级的周期往往显著快于劳动者的技能升级或转换的周期,相对于产业技术变迁,这类劳动者具有强的职业黏性,即从原有职业技能转为新的职业技能的“惰性”。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产生“逆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一些劳动者的职业技能难以适应产业技术升级而利益受损。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各类人力资源的作用,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和具有高度政策技巧性的课题。

第三,在全球化新时代,企业家也必须有新思维。从一定意义上说,产业转型升级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企业家的升级,即素质提升。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是在众多企业家的带领下实现的。企业家以什么理念办企业,以什么方式获取利润,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方向。企业家的时间眼界更决定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景,如果更多的企业家都注重于获取短

期利润,一心想“赚快钱”,那么,产业就难有真正的核心技术积累。产业核心技术的形成无不是企业家创新“耐心”的产物,没有执着的“耐心”,就难以形成真正具有中国根基的产业。

第四,产业转型升级的企业或企业家“耐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与政策环境。市场经济是需要有效治理的经济,只有精心构建治理体系,才能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当然,构建有效治理体系,并不是抑制市场发挥作用,相反,是要更有效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更不是要政府代替市场,相反,是要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治理得更完善的市场机制来决定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技术路线。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需要有新规则、新秩序与之相适应。我们看到,在有些高技术产业领域,例如信息技术(信息安全)、智能制造(机器人)、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领域,已经出现了许多必须进行新的法律规范以保证其健康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大量使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领域,市场竞争出现了许多从未有过的现象,需要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特色小镇建设重在科学规划系统安排

黄万林

特色小镇建设,是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一般意义上的产业园区,而是聚焦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素,包括了发展理念、经济技术、建设模式、城乡统筹、区域布局、生态社会等各个方面。这意味着特色小镇建设迫切需要对核心产业规划、特色文化定位、运营思维方向、长远生态保护等进行科学规划、系统安排,使之从设计到推进再到政策环境的保障等,都有统一明确的方向、系统周密的安排。

近年来,特色小镇建设有声有色,活力十足,资料显示,我国第一批127个特色小镇建设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从中可以初步总结出一个发展的基本逻辑与路径:一是从特色资源到开发特色产品和服务,通过企业投入技术和资本,对资源开展加工和塑造,发展特色产品,把自身特色变为资源优势和生产力;二是从特色产品到培育特色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形成集约化、集群化产业发展;三是从特色产业到发展特色经济,以特色产

业为支柱,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形成崭新的经济发展形态;四是从特色经济到形成特色城镇,依托产业和经济特色优势,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社会公共服务,扩大就业,提升城镇化水平。这些成效的取得,都与在建设初期就尊重实际、目标明确、规划科学分不开。

特色小镇的建设成绩有目共睹,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特色小镇起步时间不长,还是个“小学生”,存在着很多不足和问题。对此,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几大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五要五不要”:要坚持思路、方法、机制的创新探索,不要“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努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产城融合、惠及群众的新型小城镇之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因地制宜,挖掘特色优势,不要照搬照抄、“东施效颦”;一哄而上;要坚持产业建镇,做强做精做大本地最有基础、最具潜力、最能成长的特色产业,打造具有持续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特征

的独特产业生态,不要千镇一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不要“形象工程”;要坚持市场主导,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要求,发挥好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等作用,不要大包大揽。这些重要要求,应当成为各地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指南。

以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在下辖五陂镇规划建设海绵小镇为例。五陂镇总面积25平方公里,总人口2.1万,境内交通便利,山环水绕,景色秀丽,是典型的“山—水—林—田—城”的格局,山地运动等健康休闲产业已初具规模,更有一整套发达的陂塘农业灌溉系统。依托这样的生态本底,再加上深厚人文和水文化历史遗产的底蕴,本着让海绵城市建设的红利惠及城市居民的同时一样惠及乡村群众的理念,把特色小镇作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来抓,力图构建一个“产、城、人、文+美景旅游”的“山水田园养生地、产城融合海绵镇”复合载体。当地政府以打造“七个一”为目标,全方位注入“海绵

元素”:即一个海绵产业总部基地;一个海绵产业创新创业福地;一个海绵城市咨询部;一个海绵产业信息平台和互联网销售平台;一个海绵技术、产品展示馆;一个全国海绵城市建设培训基地;一个全国海绵产业永久性论坛。在空间布局上,以“一带、一核、四片区”的发展构架,建设产城融合的典范。“一带”即“十里花溪”滨河海绵景观示示范带;“一核”即特色小镇核心建设区;“四片区”分别是幸福海绵家园示范区、山地运动拓展区、休闲农业示范区和文化体验区。当地着力聚焦“海绵”这个关键点,在工作思路上提出要建立从一个咨询、规划、设计、施工、研发、后续跟进甚至包括融资在内的“中央厨房”,以此为坚实基础推动优化设计、项目建设、组建项目公司、对接龙头企业等各项工作。

这一思路做法非常值得研究借鉴。从萍乡市安源区建设海绵小镇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好的运作机制对于特色小镇建设至关重要。首先就是要“破旧去僵”,做到“活而新”。

金融助力“一带一路”

建设的四个抓手

夏义星 刘 放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旨在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扬帆“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发挥好金融的作用,牵住金融这个牛鼻子,走快、走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金融是市场的血液,经济的灵魂,金融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乃大势所趋。一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创新的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愿望强烈,但其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面临着资金短缺等问题,融资需求较大,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支持。促进资金融通、拓宽金融合作领域、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可给“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和支撑。另一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将为金融创新发展和我国金融业“走出去”开辟更广阔的空间。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自身将提升竞争力,特别是金融机构伴随客户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活动,进入当地市场,扩大海外客户,延伸和布局价值链,既有利于我国金融业拓展全球业务布局,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而且通过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和竞争,还将大提升我国金融业核心竞争力。新形势下,金融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要重视以下四个抓手:

加强发展总体规划。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涉及通道建设、产业投资、能源资源和经贸合作等方面面,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金融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强战略谋划,积极稳妥展开布局。比如,可考虑积极筹划建设“一带一路”金融中心,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并与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相互融合,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支持大型金融机构到沿线国家布局,支持沿线国家新设各类型金融机构,促进其金融体系的日趋完善,强化金融扶持经济发展的力度;营造良好的投融资信用环境,提升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大力提升多边金融机构和跨国金融机构服务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效融合。

拓展合作共赢机制。“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包括广泛的经济合作,还需要开展各领域的金融合作。比如,多边金融机构间的合作,包括亚投行、金砖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合作;沿线国家金融机构间的合作,沿线国家的各类型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各国经济开发项目以及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此外,还要重视沿线国家金融人才间的合作。“一带一路”金融发展离不开金融人才的支持。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国,中国需积极与沿线国家合作培养熟悉国际金融规则的综合性金融人才,引导沿线国家积极开展金融人才的合作与交流。

创新金融服务产品。“一带一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项目周期长、融资结构复杂等难点。如果能设计出合适的金融创新工具和产品,将“一带一路”建设红利转化为短期可见、易得的投资收益,将有助于激发各方投资意愿。在这一过程中,既可在加强项目融资、境外投资等传统金融产品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跨境并购与重组贷款、跨境融资租赁、跨境资产管理等新的金融产品服务;也可以加强在汇兑、结算等领域的合作,创新更加便捷高效的支付工具和方式,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此外,利用境内外市场盈利模式差异,培育更多跨市场、跨领域的金融服务产品,亦是题中应有之义。

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在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金融风险的管理和防范不容忽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构筑全新的风险管理架构,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包括引进各类信用担保机构,开辟各类信用风险分担职能;引进各类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一带一路”风险的透明化和信息共享,等等。总之,沿线国家要完善金融风险管理协调机制,加强各国间的金融监管合作,在维持经济发展活力的前提下,促进金融合作监管作用的有效发挥。(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国资办)

本版编辑 欧阳优

市场化机制是特色小镇的活力因子,建设中就要采用萍乡市安源区这一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机制,摒弃政府传统的大包大揽。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同样要“更好发挥作用”,做到市场主体不缺位、政府引导不越位,真正实现科学规划。

分析这个“科学规划”。首先就是在认识层面和领导层面上,把建设发展特色小镇作为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大举措,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提到重要位置;第二就是高标准、管长远,明确特色小镇的发展方向、功能定位、区划布局、产业内涵,包括特色小镇、新农村、现代农业统筹规划、协调推进;第三就是发挥协同的功能,实行企镇对接、合作共建,搞好千企对千镇,依托实体经济,充实和支撑小镇的经济基础,带动小镇产业聚集、形成规模、拉动就业、双赢共享;第四就是发挥保障的功能,制定好政策,加大扶持,制定支持特色小镇政策措施,包括定居落户、财税优惠、土地利用、三产融合、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总之,“特色”不是小镇的形容词,而是小镇的关键词,是小镇的核心元素。要把这个“特”体现到产业、生态、人文、功能等多个方面,离不开协同作用的发挥。各地都应在科学规划、统筹协调中找准特色、凸显特色、放大特色,把特色小镇这个大战略落得更实、落得更好。(作者系中共江西省萍乡市委常委、安源区委书记)